

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①

韦宗友

(内容提要)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快速崛起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中美两国在经济、安全及国际制度等领域展开了具有战略博弈性质的竞争。对此,美国倍感焦虑,担心经济影响在亚洲消退、海权优势在西太平洋地区受到挑战、科技优势丧失及制度威望受到冲击。美国的“地位焦虑”,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已经若隐若现,特朗普执政后,显著加剧。特朗普政府不仅对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提出质疑,还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人文、两岸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举措,强化对华制衡与牵制。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调整,我们一方面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要保持战略清醒与战略定力,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关键词: 美国军事与外交 中美关系 美国对华政策 特朗普政府 战略竞争 地位焦虑

2017年末和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三份重要安全文件。三份报告一致强调,大国竞争时代已经重新来临,认定中国和俄罗斯是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者”和美国国家安全的

① 感谢《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美国印太地区安全布局困境及中国应对之策研究”(14BGJ04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重点项目“美国亚太联盟战略新动向及发展趋势研究”(15JJD810007)的阶段性成果,本文还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美战略互动研究”(17JJDGJW002)的资助。

首要挑战。^①《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首次提出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构想,要通过政治、经济与安全等手段,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拓展的影响,维护“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平衡”。^②

2018年2月,曾任奥巴马政府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的科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与外交关系理事会高级研究员艾利·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事务》杂志上联名发表《审视中国:北京是如何让美国的期望成空》一文。他们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国总能以各种方式让美国对中国的期望落空。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后,美国国内各派,无论是自由贸易派、融合派,还是强硬派,曾再度对中国抱有幻想,认为中国会发生美国所期望的变化。但事与愿违,无论是“胡萝卜”还是“大棒”,美国都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动摇中国。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地区影响力在一天天增加,但却日益走向美国的对立面。“如今,华盛顿面临现代以来一个最具活力、最可怕的竞争对手。”他们提出,必须重新思考美国对华政策,将其建立在对中国现实的清醒认识而非一厢情愿的幻想之上。他们指出,“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新审视了美国的战略假设,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③

这些报告的出台及战略界的附和,标志着美国基本完成对中国的重新战略定位,形成对华新共识,美国似乎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报告流露出美国对自身霸权地位可能旁落的深深忧虑,预示今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本文从中美之间的权力变化入手,较全面地分析了21世纪以来中美两国在东亚乃至印太地区进行的战略竞争。文章指出,面对中国权力的快速上升及中美战略竞争,美国政府忧心忡忡,对自身霸权可能旁落产生了极度焦虑。这一“地位焦虑”,是特朗普执政后质疑对华接触政策,在经贸、人文、两岸关系等方面采取强硬举措,对华政策朝着制衡乃至脱钩方向演进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我们既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更要保持战略清醒与政策理性,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anuary 2018; Office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February 2018.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p.45~47.

③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2, March/April 2018, pp.60~70.

一 中美战略竞争

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劲崛起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中美两国逐渐在东亚乃至印太地区展开了某种具有战略博弈性质的竞争。这一竞争大体覆盖经济、安全及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反映出中美竞争的全面性和战略性。中美战略竞争的地域范围,也逐渐从传统的东亚地区向南、向西延伸至涵盖印度洋和南亚次大陆的整个印太地区。这一中美战略新动向,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①

(一) 中美权力变化

21世纪以来,中美之间的权力变化表现得十分明显,也是人们在谈论中美战略竞争时首先予以关注的对象。本文以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军费开支、研发投入及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四个指标作为参照,考察21世纪以来中美两国的权力变化。

1. 国内生产总值。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2016年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和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经济迎来新一波高速增长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2万亿猛增至近11.2万亿,增长近10倍;同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0.2

① 国内学者相关论述,参见阎学通、漆海霞《中美竞争前景:假朋友而非新冷战》,载《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3期,第1~23页;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第4~26页;陶文钊《中美在西太平洋的竞争与顺应》,载《和平与发展》2014年第6期,第23~42页;刘飞涛《美国强化对华竞争及中美关系的走势》,载《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49~62页;吴心伯《论亚太大变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第32~59页;刘建飞《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中美关系》,载《美国研究》2018年第2期,第9~18页;夏立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中美关系》,载《美国研究》2018年第2期,第19~33页。国外主要论述,参见Aaron L. Friedberg, "Implicatio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for the US-China Rivalry," *Survival*, Vol.52, No.4, 2010, pp.31~54; 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2; Hugh White, *The China Choice: Why We Should Share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Ashley J. Tellis, *Balancing Without Containment: An American Strategy for Managing China*,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2014; Phillip C. Saunders and Julia G. Bowie, "US-China Military Relation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39, No.5~6, 2016, pp.662~684; Jennifer Lind, "Asia's Other Revisionist Power: Why U.S. Grand Strategy Unnerves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96, No.2, March/April 2017, pp.74~82; Enrico Fels, *Shifting Power in Asia-Pacific: The Rise of China, Sino-US Competition and Regional Middle Power Allegiance*,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7; David Lai et al. eds., *Avoiding the Trap: U.S. Strategy and Policy for Competing in the Asia-Pacific Beyond the Rebalance*, Carlisle Barracks, PA: 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February 2018; Christopher Layne, "The U.S.-Chinese Power Shift and the End of the Pax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No.1, 2018, pp.89~111;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2, March/April 2018, pp.60~70。

万亿上升到 18.6 万亿,增长 1.8 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 2000 年时仅占美国的 11% 急剧攀升至 60%,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①

2. 军费开支。2000 年~2016 年间,美国军费开支由 4152 亿美元上升到 6062 亿美元(受财政赤字及自动减赤影响,2011 年以后美国军费开支逐年下降,直至特朗普上台后才扭转这一势头);同期中国军费开支由 145 亿美元(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数据为 432 亿美元)上升到 1436 亿美元(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数据为 2257 亿美元),即由美国军费的 3% 跃升至 23% 以上。^②

3. 研发投入。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2000 年~2015 年间,美国的研发投入由 2669 亿美元上升到 5063 亿美元,增长近 1.9 倍,而同期中国的研发费用则呈爆炸式增长,由 107.5 亿美元上升到 2286 亿美元,增长 20 倍以上,即从占美国研发费用的 4% 攀升至 45%。^③

4. 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统计数据,2000 年美国申请国际专利数为 38171 件,世界排名第一,占全球申请数量的 42%;而同期中国仅为 579 件,世界排名第 17,占全球申请总量的 0.6%;2016 年美国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为 56595 件,依然排名第一,但占全球申请数量的份额已经下降到 24%;而中国则跃升为全球第三大国际专利申请国,申请数量飙升至 43094 件,占全球申请数量的 18%。^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 2017 年发布的年度报告中指出,自 2002 年以来,中国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按照这样的速度,中国“将在两年后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专利申请国”。^⑤

表 1 2000 年中美在四项指标中的数据

(货币单位: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万亿)	军费开支(亿)	研发费用(亿)	国际专利(件)
美国	10.2	4152	2669	38171
中国	1.2	145(432)	107.5	579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世界军费开支数据库;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办公室网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10 年国际专利统计年度报告。

① The World Bank Data, available at: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united-states?view=chart>.

② 《新中国历年军费支出分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门户网站 2009 年 9 月 29 日,available at: <http://www.scio.gov.cn/zggk/gqbg/2009/Document/426589/426589.htm> 《2016 年中国国防预算 9543 亿元,增长 7.65%》,新华网 2016 年 3 月 5 日,available at: 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6-03/05/c_128775856.htm;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available at: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③ The World Bank Data, available at: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

④ “Information Note: The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in 2000,” Geneva, February 13, 2001, pp.7~9 “WIPO IP Facts and Figures 2017,” Geneva,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18, pp.16~17.

⑤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Yearly Review 2017: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Geneva,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17, pp.17~20.

表 2 2016 年中美在四项指标中的数据(其中研发费用为 2015 年的数据)

(货币单位: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万亿)	军费开支(亿)	研发费用(亿)	国际专利(件)
美国	18.6	6062	5063	56595
中国	11.2	1436(2257)	2286	4309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世界军费开支数据库;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办公室网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17 年国际专利统计年度报告。

表 1、表 2 数据表明,尽管中美之间仍然存在较大权力差距,但中国正在奋起直追。^①

(二) 中美战略竞争

中美战略竞争首先出现在经济与安全领域,并逐渐外溢到国际制度层面。

1. 中美经济竞争。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 自贸区倡议竞争。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与地区经济的融合度也水涨船高。中国不仅取代美国、日本成为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还积极倡导地区经济一体化,成为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领航者。2002 年中国率先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协定,吹响了地区自贸区建设的号角。此后,中国又与区域内多个国家先后签署了自贸协定。正是在中国的率先示范效应下,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强国也纷纷启动本国的自贸区战略。^② 2012 年,东盟正式提出建立涵盖东盟及印太六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倡议”(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得到中国的大力支持。同年,中日韩三国自贸区建设启动对话机制。2014 年中国提出建立“亚太自贸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倡议,推动整个亚太地区的自贸区建设。面对中国地区经济影响力的上升,特别是东亚地区自贸区建设如火如荼推进,美国担心可能被挤出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为此,奥巴马政府拾起小布什时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启动与亚太 11 国的自贸谈判,作为抵消中国地区经济影响力和分化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手段。东亚地区出现中美两个版本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倡议同台角逐局面。在奥巴马看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意义不仅是重新书写亚太经贸规则,改写地区经贸

① 美国学者史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G. Brooks)与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C. Wohlforth)从经济能力、军事能力及技术能力三个维度对比了中美之间的权力变化与差距,但对每项指标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中美之间的权力在发生变化,但中国与美国仍有巨大差距。参见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s Rise and the Fate of America’s Global Posi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0, No.3, Winter 2015/2016, pp.7~35。

② 富景筠《日本自贸区政策的演变:基于利益集团动态博弈的视角》,载《国际经济评论》,2011 年第 4 期,第 153 页。

一体化进程乃至方向,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具有深远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战略意蕴。^① 尽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倡议被“逢奥(巴)必反”的特朗普总统否决,但中美在东亚经济角逐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国地区经济影响力的疑惧更没有消失。

(2) 科技竞争。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在国家经济发展及综合国力中的重要作用。早在 80 年代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并随着国力的提升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表 1 和表 2 的数据显示,尽管美国的研发投入仍然占据绝对优势,但中国正在快速追赶。科研投入的增加,为近年来中国在科技论文发表(2016 年中国科技论文发表首次超过美国)和国际专利申请量上的“井喷”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仅如此,根据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17 年底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国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量子信息科学及高性能计算机领域与美国并驾齐驱,在下一代超级计算机和商业无人机领域超越美国,在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云计算和协作机器人等方面,中国也在大力进取,追赶美国(见表 3)。^②

表 3 中美在九大领域的技术竞争

中国领先	激烈角逐	美国领先
下一代计算机(百万兆);商业无人机	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高性能计算机	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云计算;协作机器人

资料来源: 2017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November 2017, p.532.

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跳跃式发展,美国忧心忡忡。《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在科技领域)支配数十年之后,中国科技正在崛起,将……科学家从美国吸引过去,甚至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也从国外回归,回到这一科学机遇的新乐土。”^③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年度报告警告,如果美国在上述关键科技领域失去全球领导地位,将对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带来损害,降低美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削弱美国防务工业的

① Barack Obama, “President Obama: The TPP Would Let America, not China, Lead the Way on Global Trade,”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president-obama-the-tpa-would-let-america-not-china-lead-the-way-on-global-trade/2016/05/02/680540e4-0fd0-11e6-93ae-50921721165d_story.html?utm_term=.9f4d55a4d9bb.

② 2017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November 2017, pp.507~537.

③ Ben Guarino et al., “China Increasingly Challenges American Dominance of Science,”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3,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health-science/china-challenges-american-dominance-of-science/2018/06/03/c1e0cfe4-48d5-11e8-827e-190efaf1f1ee_story.html?utm_term=.0969e016d7cb.

能力和弹性。报告建议,国会应当指导国家科技委员会并协同国家经济委员会及相关机构找出美国与中国在技术发展方面的差距,每两年制定一个提升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竞争力的全面战略计划。^①

(3) 能源与基础设施倡议竞争。亚洲存在较为突出的能源储备区与能源消费区脱节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均衡。解决这些脱节与不均衡,不仅能够促进亚洲能源与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造福相关国家,也将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早在2011年,美国政府曾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希望通过推动中亚和南亚的能源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阿富汗经济发展和国内稳定,便于美国从阿富汗抽身。^②然而,由于美国政府始终未能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更由于阿富汗动荡不安的国内局势及印度与巴基斯坦根深蒂固的矛盾与敌意,该计划虎头蛇尾,对促进阿富汗经济发展及地区能源与交通基础设施联通几乎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两年后,中国于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正式推出“一带一路”倡议。经过四年多的建设,中国与沿线国家及地区的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设施联通不断加强,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资金融通不断扩大。据统计,中国已同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同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出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③2014年~2016年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三万亿美元,中国累计投资超过500亿美元,极大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关系。特别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着力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聚焦关键通道、关键城市、关键项目,联结陆上公路、铁路道路网络和海上港口网络。”中国与“相关国家一道共同加速推进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亚吉铁路、匈塞铁路等项目,建设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等港口,规划实施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中俄、中哈、中缅等油气管道建设或运营在有序推进”^④“以中巴、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陆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重大工程为依托,一个

① 2017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November 2017, pp.24, 508.

② Hillary R. Clinton, “Remarks on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Vis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Chennai, India, July 20, 2011, available at: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1/07/168840.htm>.

③ 《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外交部网站,2018年3月8日, available at: <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540582.shtml>.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办公室《“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在贸易畅通方面取得5大成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7年5月10日, available at: <http://www.scio.gov.cn/xwfbh/xwfbh/wqfbh/35861/36637/zy36641/Document/1551290/1551290.htm>.

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①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快速推进及沿线国家的广泛参与,引起美国政府和战略界的高度关注和疑虑。美国政府及媒体一方面放大“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风险与环境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私下或公开采取措施阻挠、诋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② 奥巴马政府曾不遗余力地阻止其东西方盟友参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特朗普政府则表示要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印太国家探讨联手建设地区基础设施,为印太国家提供不同于中国的“替代性选择”。^③

2.中美安全竞争。它主要体现在军事战略及海权两方面。

(1) 军事战略竞争。长期以来中国奉行积极防御的国防与军事战略,同时根据国际局势和军事技术变化,进行相应的战略调整。2004年12月,中国发布国防白皮书,首次明确提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成为我国军事战略的指导思想。在2015年的国防白皮书中,继续强调“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加强军事斗争准备,同时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战略态势,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周边安全稳定。^④ 在这一军事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加快推进军事装备和武装力量的现代化和信息化建设,重点打造导弹、静音潜艇、大型水面舰艇、隐形战机、无人机等尖端武器,同时构建中国版的一体化军事指挥信息系统,提升导弹、飞机、水面舰艇、潜艇及无人机的精确打击能力和网络战能力,更好地“预防危机、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⑤

在美国看来,中国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及发展以陆基导弹、静音潜艇、大型水面舰艇及无人机为突破口的武器装备,实质是要在西太平洋地区构筑一道阻隔美国军事力量和投射能力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防火墙,是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军事优势地位和军事行动自由的挑战。为此,美国军方于2009年正式引入“空海一体战”概念,并于2011年成立“空海一体战”办公室,应对中国的“反介入”和

①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新华网,2017年5月14日,available at: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

② Rex W. Tillerson, “Remarks on ‘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for the Next Centur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October 18,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7/10/274913.htm>。

③ Phillip Coorey, “Australia Mulls Rival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with US, Japan, India,” *Financial Review*, February 18, 2018, available at: <http://www.afr.com/news/australia-mulls-rival-to-chinas-belt-and-road-with-us-japan-india-20180216-h0w7k5>。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军事战略》201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available at: http://www.mod.gov.cn/affair/2015-05/26/content_4588132.htm。

⑤ 胡波《中美西太平洋的军事竞争与战略平衡》,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第71~72页。

“区域拒止”能力。^①“空海一体战”主张在战时迅速瘫痪对方的一体化指挥信息系统,并不惜一切代价深入对方腹地摧毁重要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资源,如敌方的导弹基地、发射场、飞机场等。如果付诸实施,将会引发难以预料的战争后果,因而遭到美国国内的诸多反对。^②2014年秋,美国各军种司令一致同意将“空海一体战”概念重新命名为“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作战概念,将陆军军种也纳入一体化作战指挥系统,并将原先针对特定国家(主要是针对中国)改为针对所有对手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2015年,“空海一体化”办公室也更名为“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办公室。^③尽管“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作战概念没有“空海一体化作战”概念那么刺耳,但其针对中国的意味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

(2) 海权竞争。作为马汉海权论的信徒和践行者,美国对全球海洋的控制近乎痴迷。美国不仅拥有全球最强大和技术最为先进的海军,还在世界各地遍布军事基地,控制着全球主要的海上航线和海上交通咽喉。在印太地区,美国拥有密集的海空军事基地,部署全球最先进的空中和海上军事平台,扼守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及印度洋的海上通道,控制从北非、中东至南海的印太海上商业与能源交通线与咽喉。中国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长期以来中国的军事战略思想一直重陆轻海,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才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④与这一战略目标相一致,中国政府加大了海洋资源和能源的考察开发力度,高度重视维护我国合法海洋权益,海洋维权与维稳并举,并加速推进海军现代化建设。大型深海石油钻井平台及勘探设备的研发与投入使用,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钓鱼岛维权斗争及南海岛礁建设的推进,第一艘航母的服役及新型导弹驱逐舰和其他舰艇的陆续下海,不仅有力捍卫了我国的海洋权益,也让西太平洋地区的中美海上力量平衡发生了微妙变化。据北京大学胡波研究员的研究,在第一岛链内,中美海权对比正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尽管在第二岛链外,美国仍占绝对优势。^⑤美国军方和战略家对中美海权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变化极为敏感,认为中国正在侵蚀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

① Air-Sea Battle Office, “Air-Sea Battle: Service Collaboration to Address Anti-Access and Area-Denial Challenges,” May 2013, pp.1~13.

② 胡波《中美西太平洋的军事竞争与战略平衡》,第73~76页。

③ Michael E. Hutchens et al, “Joint Concept for Access and Maneuver in the Global Commons: A New Joint Operational Concept,” *Joint Force Quarterly*, Vol.84, No.1, 2017, pp.134~136.

④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

⑤ 胡波《中美西太平洋的军事竞争与战略平衡》,第69~84页。

军事优势 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海上霸权。^①

中国快速崛起及中美在印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竞争,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经济与安全的“双主导”地位,^②形成了“经济上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地区“二元结构”或“双领导体制”。即便在安全领域,也逐渐出现有利于中国的军事态势变化。^③

3. 中美国际制度之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及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等自由制度主义学者认为,美国的霸权不单纯建立在硬实力基础上,更建立在“一系列隐含或明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所构建的制度之上,后者让美国即便硬实力衰退依然维持霸权地位。^④显然,这样的制度并非“中性的”,它们反映了创建者及主导者的价值、利益及偏好。正如安德鲁·哈瑞尔(Andrew Hurrell)所言,制度不是纯粹的中立场所,它反映了特权,是权力和竞争的场域。^⑤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 WB)等国际金融制度正是这样的国际制度。中国人民大学李巍副教授认为,中美在国际制度领域的竞争,首先发生在金融领域。^⑥在全球经济及金融治理方面,二十国集团(G20)取代七国集团(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首次以平等身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既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长期斗争的成果,也是他们全球经济地位日益上升的重要体现。在金融制度改革方面,在中国等国的施压下,美国被迫答应并最终批准了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份额权改革,提升了中国的发言权与投票权,并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极大提升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① Aaron L. Friedberg, “Competing with China,” *Survival*, Vol.60, No.3, June-July 2018, pp.34~38; Shane C. Taylor, “Crossover Point: How China’s Naval Modernization Could Reverse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dvantage,” *Journal of Asi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 No.1, 2017, pp.1~25.

② 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指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双主导地位,实际上就是“美国出口安全,进口商品”。G. John Ikenberry, “Between the Eagle and the Dragon: America, China, and Middle State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31, No.1, 2016, pp.9~43.

③ 赵全胜《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第7~26页;王俊生《中美双领导体制与东北亚安全:结构失衡与秩序重建》载《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4期,第99~113页;周方银《东亚二元格局与地区秩序的未来》载《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6期,第106~119页。不过,刘丰对东亚地区“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二元领导格局持不同意见,参见刘丰《东亚地区秩序转型、安全与经济关联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第36~55页。

④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⑤ Andrew Hurrell, *On Global Order: Power, Value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1.

⑥ 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7页。

中美之间的国际制度竞争还体现在“创制”上。2009年,为加强合作,协调立场,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制改革,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举行了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峰会,启动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合作机制。2011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由四国拓展为五国。2013年,金砖国家一致同意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加强金砖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2015年7月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正式开业,是自1991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以来设立的第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多边贷款机构,标志着金砖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迈入务实新阶段。^①另一更具标志性的制度创设,是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个拥有57个创始会员国的多边金融机构,是在美国政府阻挠和反对下,由中国牵头成立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反映出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影响力,也更为直观地显现出中美之间的制度博弈,^②尽管中美两国政府都刻意淡化这种竞争。

二 美国的“地位焦虑”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他那本名噪一时的著作中指出,权力变化及与之伴随的大国兴衰,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变更这一铁律,成为屹立不倒的“千年罗马”。^③然而,戴尔·卡普兰(Dale C. Copeland)、格拉汉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等人的研究显示,历史上没有哪个霸权国心甘情愿地将霸权拱手相让,对权力和地位的迷恋是国际关系的常态。^④耐德·勒庞(R. Ned Lebow)在对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的霸权战争的细致研究中发现,雅典的崛起及其对斯巴达作为希腊世界领导者地位的致命威胁与挑战,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源。^⑤都铎·欧尼尔(Tudor A. Onea)则重构了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竞争逻辑,认为霸权国往往比崛起国更易于“焦虑”,也更具有进攻性。他指出,霸权国的“地位焦虑”——优势地位在经济、军事及尊严等任何方面被他国超过时所表现的不安全感——常常导致其试图阻止崛起国的上升,力图在依然领先的领域维持优势,在已经落后的领域弥补损

① 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第95~98页。

② G. John Ikenberry and Darren J. Lim, “China’s Emerging Institutional Statecraft: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the Prospects for Counter-Hegemony,” Project on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Strategy at Brooking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pril, 2017, pp.1~18.

③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31~522页。

④ 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2000, pp.16, 61~116;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pp.vii~ix, 89~240.

⑤ R. Ned Lebow,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Ethics, Interests, and Orde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99~104.

失。“对霸权国来说,在所有领域都最为接近的竞争者,即为对其地位最具威胁的国家”。“结果往往是,为了保住既有地位,霸权国比崛起国更愿意承担风险,后者则更愿意规避风险,更愿意妥协。”^①对此,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C. Wohlforth)指出,高级地位本身就是稀缺资源,其竞争常常是零和游戏。“地位焦虑”常导致大国之间难以妥协,甚至为了琐碎问题兵戎相见。^②

作为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中之间的地位竞争不言而喻。对中国来说,随着自身实力增长和利益拓展,要求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更好维护自身权益,在国际制度中获得更大发言权,在国际威望等级中更进一步,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与诉求。然而,在中国眼中合乎逻辑之事,在美国看来,却可能是挑战与威胁。毕竟,国际地位与威望是稀缺资源,国际政治顶级俱乐部的会员名单屈指可数。中国威望每进一步,在美国看来可能就是其地位和威望的相对下降。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来说,“地位是稀缺资源,竞争具有零和性,一方之所得(所失),即对方之所失(所得)。”^③对地位可能旁落的焦虑往往让美国无法理性看待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和中国实力的上升,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浮想联翩,甚至对中国的无害或善意举动疑虑重重。

美国的地位焦虑突出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取代美国在亚洲经济地位的担心。中国取代美国和日本成为亚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积极支持以东盟为主体的地区经贸一体化进程,努力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倡导成立亚太自贸区,提出横跨欧亚大陆及印太海域的“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推进欧亚非基础设施及能源与贸易的互联互通,令美国担心,在欧亚地区出现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发展模式为主导的区域贸易集团,而曾经的领导者美国则逐渐被边缘化。^④奥巴马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感叹,“中国令人惊叹的(经济)增长……以及通过贸易与投资网络彻底融入地区经济体,已经永久性改

① Tudor A. Onea, “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 Sta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0, 2014, pp.125~136.

② William C. Wohlforth, “Unipolarity, Status Competition, and Great Power War,” *World Politics*, Vol.61, No.1, January 2009, pp.28~35.

③ Randall L. Schweller, “Realism and the Present Great Power System: Growth and Positional Conflict Over Scarce Resource,” in Ethan B. 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8~29.

④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House, Asia and the Pacific Subcommittee Hearing, “Development Finance in Asia: US Economic Strategy Amid China’s Belt and Road,” November 15, 2017, available at: <https://foreignaffairs.house.gov/hearing/subcommittee-hearing-development-finance-asia-u-s-economic-strategy-amid-chinas-belt-road/>.

变了地缘政治图景。”^①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委员乔纳森·斯蒂福斯(Jonathan N. Stivers) 告诫,“中国正在调动全部国家和私营部门资源,全力塑造亚太地区,以便将中国置于地区经济与安全活动的中心。……美国需要一个全新的协调一致的亚洲经济和发展政策,以便与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投资和影响进行有效竞争。”^②

二是对中国可能挑战美国科技优势的担忧。随着中国对科技研发投入的加大,在人工智能、下一代超级计算机和量子信息科学等领域的跳跃式发展和崭露头角,美国对可能丧失自身科技优势深感忧虑。美国认为,中国的这些技术进步与中国政府的“创新重商主义”政策、特别是《中国制造 2025》等产业政策的制定,有着莫大的关联。指责中国政府正在通过政策扶持、强制技术转让以及海外投资并购等“不公平手段”获取西方先进技术,确立本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地位,排挤外国竞争,“垄断”国内市场。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 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制造 2025》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挑战,不仅对我们,对欧洲、日本及全球贸易体系都是严肃挑战”。^③他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强调,“如果中国在这些(高科技)领域取得世界支配地位,将是美国的噩耗”。^④莱特希泽的看法得到美国智库与学界的呼应。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罗伯特·司各特(Robert E. Scott) 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在成百上千亿美元的公共投资激励下,通过日益复杂的工业计划体系,中国的技术能力正在快速提升,对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及国家安全构成巨大挑战。……全球先进技术产品贸易已经被中国所支配,而这一向被视为美国的竞争优势之源。”^⑤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 在同一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大力推行“创新重商主义”政策,通过诸如《中国制造 2025》等政策手段寻求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全球优势地位,挑战美国

① 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Strateg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 pp.2~3.

② “Statement of Jonathan N. Stivers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Development Finance in Asia: U.S. Economic Strategy Amid China's Belt and Road’,” November 15, 2017, available at: <http://docs.house.gov/meetings/FA/FA05/20171115/106635/HHRG-115-FA05-Wstate-StiversJ-20171115.pdf>.

③ Wayne M. Morrison, “China's Economic Rise: History, Trend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ebruary 4, 2018, p.48.

④ Matt Sheehan, “Trump's Trade War Isn't About Trade, It's About Technology,” *Macro Polo*, April 3, 2018, available at: <https://macropolo.org/trumps-trade-war-isnt-trade-technology/>.

⑤ Robert E. Scott, “China's Technological Rise—Challenges to U.S. Innovation and Security,” 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of the House Sub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April 26, 2017, available at: <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FA/FA05/20170426/105885/HHRG-115-FA05-Wstate-ScottR-20170426.pdf>.

的科技优势。他警告,如果美国失去了在高科技产业的主导地位,将不仅对美国的经济与繁荣造成重大消极影响,也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及防务工业基础造成冲击。因为“美国的全球防务领导地位不仅仅基于我国的规模及美国在国防上的资金投入,更是基于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①对此,美国一位智库学者揶揄道,“在中美经济竞争叙事中,《中国制造 2025》正被描绘成对美国技术领导地位构成生存威胁的恶棍。”^②

三是对中国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军事霸权的忧虑。新世纪以来,中国军费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涨船高。2018年3月,中国政府公布了2018年的国防预算,总额为11069.51亿人民币,约175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8.1%。^③尽管军费开支的比例不足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但依然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军费开支国。同时,中国海军的大力发展,新型隐形战机和大型运输机的研发与陆续装备,网络及电子战技术的快速追赶,以及弹道导弹技术的长足进步,使得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力平衡逐渐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特别是在第一岛链内。作为美国霸权重要支撑的军事优势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流失,美国忧心如焚。美国前大使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指出,“中国日益上升的国防能力正在侵蚀美国的优势。中国的新型反航母武器威胁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投射能力;反卫星计划威胁美国的全球监视与通讯能力。……这些不仅仅是对美国霸权,也是对美国核心利益的严肃挑战”^④美国前参议员吉姆·塔伦特(Jim Talent)断言“可以公允地说中国正在谋求至少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地位”“该地区的平衡正在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变化……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他们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心无旁骛地发展军力……他们正在或已经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同辈竞争者。”^⑤

四是对中国挑战美国国际制度领导权的担忧。国际制度是美国的霸权之翼,也是美国维护利益、塑造规则、影响国际议程的重要权力场域。^⑥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

① Robert D. Atkinson, 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of the House Sub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April 26, 2017, available at: <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FA/FA05/20170426/105885/HHRG-115-FA05-Wstate-AtkinsonR-20170426.pdf>.

② Adam Segal, “Why Does Everyone Hate Made in China 2025,”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28,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cfr.org/blog/why-does-everyone-hate-made-in-china-2025>.

③ 周炎明《紧扣使命任务强化军费战略管理》,《解放军报》2018年3月21日。

④ Chas W. Freeman, Jr., “China’s Challenge to American Hegemony: Remarks to the Global Strategy Forum,” London, Middle East Policy Council, January 20,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mepec.org/articles-commentary/speeches/chinas-challenge-american-hegemony>.

⑤ Jim Talent,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Rising China,”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December 8,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heritage.org/defense/report/us-national-security-and-rising-china>.

⑥ 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307页。

体一道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制,通过新开行和亚投行等金融机构的创制,令美国担心,中国不仅要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对美国的领导权发起挑战,更要“另起炉灶”打造一个平行的、竞争性的国际制度。美国国会迟迟不批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权改革,奥巴马政府倡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就是分别在既有制度框架下阻挠及在新制度框架下狙击中国谋求制度威望的重要举措。^①对此,奥巴马在2015年的国情咨文中说得十分清楚,“中国想要为世界发展最快的地区书写规则,如果这样将对我国的工人和商业不利。……我们应该书写这些规则,建立公平的(贸易)机会。”^②伊肯伯里等人认为,中国通过改制和建制两种“制度外交”(institutional statecraft)努力,寻求挑战和削弱美国领导的全球和地区制度。特别是通过创建诸如亚投行等新制度的“反霸”努力,中国将实现三重战略目标:对既有制度体系部分规则、实践及规范的改革;增加中国在既有制度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的影响和威望,相应削弱美国的影响与威望;倡导竞争性国际秩序的规则、原则及规范。^③冯惠云、贺凯等学者则认为,中国通过两种不同类型的“制度制衡”挑战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④

五是对“中国模式”吸引力的担忧。早在2008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和学界就曾担心,鉴于美国和欧洲面临的经济困境以及中国经济在危机期间的强劲表现,西方治理及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将大打折扣,而“中国模式”的吸引力会大幅提升。“中国将不仅为发展中世界那些沆瀣一气的不自由政府提供意识形态激励,还将成为他们强大的金融盟友”。^⑤21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美国更加担心,中国国家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投资模式将成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效仿的榜样。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示“中国试图取代

① 赵洋《中美制度竞争分析——以“一带一路”为例》,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2期,第41~43页。

②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U.S. Capitol, January 20, 2015, available at: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5/01/20/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january-20-2015>.

③ G. John Ikenberry and Darren J. Lim, “China’s Emerging Institutional Statecraft: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the Prospects for Counter-Hegemony,” Washington, D.C., Project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Order and Strategy at Brookings, April 2017, pp.1~14.

④ HuiyunFeng and He Kai, “China’s Institutional Challenges to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11, No.4, Winter 2017, pp.23~49.

⑤ Richard Feinberg, “China, 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gruent Interests or Tectonic Turbulence?”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46, No.2, 2011, pp.219~220; Stef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Shaun Breslin, “The ‘China Model’ and the Global Crisis: From Friedrich List to A Chinese Mode of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7, No.6, 2011, pp.1323~1343.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拓展国家驱动经济模式的影响,并按照自身利益重建地区秩序。”^①加州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指出,中国日益上升的地缘战略影响、崛起的软实力及持续的经济成功,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将把中国视为效仿对象,会受到中国政治模式的吸引,后者主张中央行政控制,避免了西方民主的混乱。^② 尽管中国领导人一再向外界表明,中国不会“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③但美国依然不放心,认为中国会出口中国模式,作为西方民主和西方规范的替代性选择。^④

为应对中国崛起挑战和战略竞争,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美国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战略。

三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

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轴一直是接触政策,试图通过将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逐渐塑造、影响乃至改变中国的内外政策和制度偏好。^⑤ 然而,到了奥巴马时期,美国国内质疑接触政策的声音逐渐抬头,认为中国从接触政策中获得了巨大好处,国力蒸蒸日上,但却日益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满,外交上咄咄逼人,并试图修正、改写既有制度规则,甚至另起炉灶,挑战美国霸权。不仅如此,中国在政治体制上也变得日益保守,并没有发生美国所期待的政治变化。^⑥ 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经贸倡议,目的之一是通过全面强化与亚太军事盟友及安全伙伴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抑制中国地区影响,维护美国霸权地位。不过,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基本盘并没有发生根本变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17, p.25.

② Barry Eichengreen,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Project Syndicate*, May 10,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bigpicture/debate-the-china-model>.

③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④ John J. Hamre, “Forward,” in James A. Lewis ed.,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Responding to China's Managed Econom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nuary 2018, p. iv.

⑤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pp.60~70.

⑥ Aaron L. Friedberg, “The Debate Over US China Strategy,” *Survival*, Vol.57, No.3, June~July 2015; Ely Ratner, et al., “More Willing and Able: Chart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ctivism,”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y 2015; Thomas J. Christensen, “Obama and Asia: Confron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Vol.94, No.5, September/October 2015; 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 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pecial Report* No. 72, March 2015; 吴心伯《特朗普执政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第80~93页。

化,奥巴马本人也多次表示,亚太再平衡战略并非针对中国,相反与中国接触是这一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①

然而,特朗普执政后,其对华战略开始发生重大调整,接触政策的“前提”和“理由”受到严重质疑,对华政策基调由接触转向制衡和脱钩。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调整与变化,不仅体现在发布的官方战略与政策文件中,更体现在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举措上。

第一,对接触政策提出质疑。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基于这一信念,即支持中国崛起和融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将会让中国自由化。但事与愿违,中国正以损害他国国家主权的方式拓展权力,以无人企及的规模收集和利用数据,传播威权主义体制的特征……,建立仅次于美国的强大而军费充足的军事力量,拓展核武库并实现多元化。”不仅如此,报告认为,中国还试图在印太乃至全球削弱美国影响,改变既有国际秩序,提供替代性的威权主义模式。凡此种种,“要求美国重新思考过去20年的政策假设,即与竞争对手的接触及将他们融入国际制度和全球商业会将其转变为善意的行为体及值得信赖的伙伴。总体来看,这一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②

特朗普本人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占美国便宜”,通过“不公平贸易”从美国获取了巨大好处,应该重新检讨美中经贸关系,确保“公平与对等”,维护美国商业利益。^③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明确将经济安全界定为国家安全,表示绝不容忍其他国家在美国的“经济入侵”和“不公正贸易”;要大力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维护美国的创新优势;强化外国对美国高技术领域的投资审查,收紧技术签证政策,打击网络经济活动,严防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和高技术的“偷窃”。^④概言之,特朗普政府否定了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前提与基础,要求改弦易辙。

第二,将中国定性为国际体系修正主义力量和美国战略竞争对手。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战略定位曾数度摇摆,但基本将中国视为国际体系的建设性力量。克林顿

① Justin Sink, “Obama: US Goal Not to ‘Counter’ China,” *The Hill*, April 28, 2014, available at: <http://thehill.com/policy/international/204506-obama-us-goal-not-to-counter-china>;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5, 2015, available at: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5/09/25/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xi-peoples-republic-china-joint>.

②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3.

③ Veronica Stracqualursi, “10 Times Trump Attacked China and Its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US,” *ABCNews*, Nov. 9, 2017, available at: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10-times-trump-attacked-china-trade-relations-us/story?id=46572567>.

④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p.3, 17~22.

时期将中国视为战略合作伙伴,小布什虽然在竞选期间将中国描绘为“竞争对手”,但执政后部分出于反恐战争的需要,认为中国是可以合作的伙伴,并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奥巴马时期,中美两国竞争与合作并存,特别是在其第二任期后期,美国国防部及战略界逐渐倾向于从竞争角度看待中美关系。国防部长卡特曾在多个场合大谈美国面临的五大威胁,即俄罗斯与中国的大国竞争威胁,伊朗与朝鲜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政权”威胁,以及中东恐怖主义威胁。^①但是,奥巴马政府始终没有明确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在国防部长卡特列举的五大挑战中,俄罗斯首当其冲,排在第一位。然而,在特朗普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中国不仅被描绘为试图颠覆现状的修正主义大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更是排在美国面临的五大安全挑战之首。报告认为,中国在全面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与利益,试图削弱美国的安全与繁荣。^②国防部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也强调,“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正在运用军事现代化、影响行动及掠夺性经济强制邻国,按照自身利益重塑印太秩序,在近期寻求印太地区的霸权,其未来目标则是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③2018年5月2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宣布“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是美国的优先关注,要求整合包括外交、经济、情报、执法及军事等多种国家权力要素,保护与促进(美国)国家安全”,重新评估中国对美威胁,制定新的对华战略。^④

第三,通过施压与脱钩,扭转中美经贸“失衡”、维护美国技术优势。特朗普政府认为,不仅几十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了,美中经贸关系也严重失衡、不公正,对美国的经济健康和科技领先优势造成损害。特朗普在多个场合大谈中美经贸关系的不公平、不对等,指责中国的经贸政策乃至历届美国政府的“听之任之”,要求大幅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平衡中美经贸关系,应对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窃取”。^⑤

2017年4月和8月,美国政府先后发起对进口钢铝产品的232调查和针对中国知识产权政策及行为的301调查。2018年1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中国加入

① Lisa Ferdinando, “Carter Outlines Security Challenges, Warns Against Sequestration,” DoD News, Defense Media Activity, March 17,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defense.gov/News/Article/Article/696449/carter-outlines-security-challenges-warns-against-sequestration/>.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25.

③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8, p.2.

④ GPO, H.R. 5515, 115th Congress,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 2018, pp.637~640.

⑤ “Trump Tweets ‘I Don’t Blame China’ for Trade Imbalance,” *Fox News*, November 10, 2017, available at: <http://www.foxnews.com/politics/2017/11/09/trump-tweets-dont-blame-china-for-trade-imbalance.html>;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Signing of a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Targeting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Washington, D.C., March 22,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signing-presidential-memorandum-targeting-chinas-economic-aggression/>.

世界贸易组织合规情况调查报告,指责中国没有认真履行入世协议,宣布不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① 1月和3月,特朗普政府公布232和301调查结果。这些调查报告宣称,中国的钢铝产量严重过剩,对全球市场造成重大消极影响,危及美国钢铝行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中国和技术转让、技术许可及知识产权政策等方面对美国企业构成歧视或限制。据此,特朗普政府宣布对美国进口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②其中涉及中国出口钢铝产品金额约30亿美元;威胁对进口自中国的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③ 尽管中美两国为此进行了多轮密集磋商,并一度达成某种妥协,“暂停”贸易战。^④ 但5月29日,特朗普政府突然改口,宣布将对进口自中国的价值500亿美元的高科技产品征收25%的关税,并对中国旨在获取美国工业技术的投资实施特别限制以及加强出口管制。^⑤ 7月6日,美国正式启动对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首批总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将受到影响。7月1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拟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的清单,公开征求美国公众意见。^⑥

此外,美国政府还在酝酿收紧中国科研人员和留学生赴美从事高技术研究和学习签证的政策。通过这些举措,特朗普政府不仅要扭转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还要阻断美国高科技流向中国。

第四,以政治渗透为借口,收紧中美人文交流。特朗普的对华脱钩政策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还表现在中美人文交流方面。自2017年底,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质疑乃至抹黑中美人文交流活动的声音,指责中国在美国高校设立的孔子学院与中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活动对美国高校的学术和言论自由产生消极影响;指责中国媒体是政府的传声筒,美化中国形象;对数量庞大且不断增加的中国在美留学生和

①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7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 Washington, D.C., January 2018.

②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Adjusting Imports of Steel into the United States,” March 22,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presidential-proclamation-adjusting-imports-steel-united-states-2/>.

③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Signing of a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Targeting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④ Zachary Warmbrodt and Doug Palmer, “China Trade War ‘on Hold’ As Trump Pauses Tariffs,” Politico, May 20,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8/05/20/mmuchin-china-trade-war-598481>.

⑤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s Confronting China's Unfair Trade Policies,” May 29,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steps-protect-domestic-technology-intellectual-property-chinas-discriminatory-burdensome-trade-practices/>.

⑥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Statement by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Robert Lighthizer on Section 301 Action,” Washington, D.C., July, 2018, available at: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july/statement-us-trade-representative>.

访问学者感到担忧,认为很多中国在美留学生及学者社团组织都与中国政府有联系或受到政府资助,对美国的校园学术自由构成潜在挑战,甚至有可能成为中国政府对美进行政治影响和渗透的工具。^① 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及国防战略报告中,都提到修正主义大国(或威权主义国家)通过宣传、颠覆和“影响行动”威胁脆弱民主国家及美国等国的民主制度,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2018年1月初,特朗普下令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跨部门小组,对中国在美国的影响行动展开调查,范围涉及孔子学院、智库、媒体及商业活动等广泛领域。2月初,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致函四所佛罗里达州境内大学,要求他们关闭校内的孔子学院、汉语语言和文化教育中心。他在信中表示,“鉴于中国政府日益企图利用孔子学院及其他手段影响外国学术机构”,试图“渗透美国课堂、扼杀自由探究、颠覆自由表达”“敦促你们考虑终止孔子学院的协议”。^②

2月13日,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就中国可能通过学术研究、实验室合作、商业投资与并购,窃取美国先进技术进行听证。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伊(Christopher Wray)在听证会上表示,联邦调查局正在“严密监视”、甚至着手调查一些孔子学院。他指出,学术部门的“天真”加剧了这一问题,“他们(中国)正在利用我们所珍视的开放研发环境,我们不仅要中国威胁看成是(中国)政府构成的威胁,更要视为整个(中国)社会构成的威胁,我们应该采取全社会的应对方式。不仅情报部门,我们的学术机构、私营部门都要增强意识,筑起防线。”^③

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也要求,对中国利用政治影响、信息行动、审查和宣传,削弱民主制度与程序,削弱言论表达自由、新闻及学术思想自由的行动,展开调查与评估,制定应对措施。^④

第五 提升美台关系,以台制陆。侯任总统期间,特朗普就曾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通电话、并声称“我不懂为什么我们必须受到一个中国政策的约束,除非我们与中国

①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17; Bethany Allen-Ebrahimian, “China’s Long Arm Reaches into American Campuses,” *Foreign Policy*, March 7, 2018, available at: <http://foreignpolicy.com/2018/03/07/chinas-long-arm-reaches-into-american-campuses-chinese-students-scholars-association-university-communist-party/>.

② Elizabeth Redden, “More Scrutiny for Confucius Institutes; One to Close,” *Inside Higher ED.*, February 6,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quicktakes/2018/02/06/more-scrutiny-confucius-institutes-one-close>.

③ Elizabeth Redden, “The Chinese Student Threat?” *Inside Higher ED.*, February 15,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8/02/15/fbi-director-testifies-chinese-students-and-intelligence-threats>.

④ GPO, H.R. 5515, 115th Congress,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 2018, pp.639~640.

达成交易。中国必须在包括贸易等问题上采取行动。”^①尽管在中国政府的严词抗议和斗争下 特朗普表示承认一个中国政策 但是他想拿台湾问题要挟 或以台制陆的意图并没有彻底消失。

2018年3月16日 特朗普签署了国会通过的《与台湾交往法》。该法鼓励所有级别的美台官员交流,“允许包括内阁级的国家安全官员、将军及其他行政部门官员赴台旅行,会晤台湾同级别官员;允许台湾高级官员进入美国并会晤国务院、国防部及其他内阁机构的官员,提供能够体现对其尊严恰当尊重的条件;鼓励台北经济与文化代表处及台湾(在美)成立的其他机构在美开展业务。”^②如果该法付诸实施 将开启美台高级别官员会晤之法律禁忌 实质性提升美台关系。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也加大了对台湾问题的“关注”。一方面要求加强台湾的军备 提升台湾的军事自卫能力、“支持美国对台军售和其他设备转让 尤其是发展(台湾)的不对称作战能力”;另一方面要根据《与台湾交往法》提升美台军事交流级别 要求国防部派遣一名三军军种部长或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赴台进行高级别防务交流。^③ 如果这些条款未经变动在参议院通过 并由特朗普总统签署为法律 将进一步提升美台军事合作与军事交流层级 严重干扰中美关系。

第六 通过“印太战略”牵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南海维权行动。自2017年10月份以来 特朗普政府先后通过国务卿外交政策演说、总统东亚访问、颁布战略文件、政府官员出席国会听证及国防部长出席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等渠道和方式 向外界传播、宣示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这一战略的要点在于:视中国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大战略威胁 通过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及印度等印太国家的经济与安全合作 制衡中国影响 捍卫“自由与开放的印太秩序” 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具体举措包括:与日本、印度等国一起加强在亚洲能源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金融合作与政策协调,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同台竞争;诋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夸大金融风险和环境、社会和政治负面影响;提升美印关系,以南亚大国印度对冲中国的地区影响;恢复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合作(西方媒体所谓的“四国联盟”) 牵制中国在南海地区的

① Alan D. Romberg, “The Bull in the China Shop,”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Hoover Institution, Issue 52, Winter 2017, February 14, 2017, pp.6~14.

②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Signs H.R. 294, H.R. 452, H.R. 535, H.R. 3656 and S. 831 into Law,” March 16,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signs-h-r-294-h-r-452-h-r-535-h-r-3656-s-831-law/>; GPO, H.R. 535, 115th Congress, *Taiwan Travel Act*, 2018, pp. 1-2.

③ GPO, H.R. 5515, 115th Congress,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 2018, pp.642~643, 656~657.

维权行动 制衡中国海权发展。^① 在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中,明确提出“美、日、印、澳四国应该促进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增加四边会议频率,讨论与加强彼此军事及海军的配合作战能力;计划四国海军联合军事演习;探究四国在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联合倡议;增强印太地区国家的海上能力建设。另外,为突出印度的重要性及强调美国对印太两洋及沿海区域的高度重视,该法案建议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② 2018年5月30日,国防部长马蒂斯正式宣布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

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将朝核问题作为施压中国的工具,要求中国全面配合美国对朝鲜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甚至将朝核问题与中美经贸问题挂钩。在美朝首脑新加坡会晤后,特朗普一方面对中国在半岛无核化上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感谢,但另一方面一旦美朝在落实无核化谈判中出现问题,就开始对中国进行无端怀疑甚至指责。

四 中国如何应对?

当前,中美关系无疑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旧的共识已经坍塌,新的政策框架尚未定型。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两国国内对对方战略意图和中美两国关系的前景,都日益负面和悲观,特别是美国国内,弥漫着对华失望、疑虑和焦虑情绪。

在这一中美关系的临界点上,要避免中美关系滑向新冷战,防止中美走向全面对抗与对立,作为崛起大国的中国,更要有清醒的战略判断和理性务实的战略思维,不盲动、不焦躁,保持战略定力;同时要善于从对方立场思考问题,保持策略的灵活性。

首先,要对美国对华战略有着基本正确的把握和判断。必须认识到,尽管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认为过去几十

① Rex W. Tillerson, “Remarks on 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for the Next Century,”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October 18,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7/10/274913.htm>; Donald J. Trump,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PEC CEO Summit, Da Nang, Vietnam,” Da Nang, Vietnam, November 10,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apec-ceo-summit-da-nang-vietnam/>;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ubcommittee Hearing American Leadership in the Asia Pacific, Part 5: The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May 15,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hearings/american-leadership-in-the-asia-pacific-part-5-the-asia-reassurance-initiative-act-051518>;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marks by Secretary Mattis a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18 Shangri-La Dialogue,” June 2,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View/Article/1538599/remarks-by-secretary-mattis-at-plenary-session-of-the-2018-shangri-la-dialogue/>.

② GPO, H.R. 5515, 115th Congress,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 2018, pp.648-651.

年的对华接触政策不成功,要重新思考对华政策。但是,特朗普并没有打算要与中国彻底翻脸,美国战略界也没有想好未来要怎么与中国打交道。^①也就是说,美国对华战略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旧的政策共识基本瓦解,但新的政策共识还没有完全成型,还在酝酿、摸索阶段。

其次,理性看待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特朗普发起贸易战,不是要彻底改变中美关系,而是要部分改变中国的经济与产业政策以及经贸失衡,特别是认为可能危及美国企业在华利益及美国科技创新优势的经济与产业政策。实际上,特朗普一直声称与中国领导人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也希望在朝核等问题上获得中国的帮助。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特朗普不想让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演变为两国之间的全面对立和对抗。其实,在特朗普“死磕”中国的表象下,中美两国可以找到回旋的空间。中国政府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宣布了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按照这一逻辑,中国在特朗普极为关心的中国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扶持及财政、金融和税收优惠等政策上,做出积极和正面回应,或许能够为当前的贸易战找到降温的办法。

再次,我们要对自身的战略利益有着清晰的认识和判断,不盲动、不冒进。当前,我们正处于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历史起点上。我们的一切内政外交都必须紧紧服务于这个大局。凡是有利的,我们就坚持,不利的,就改之。在这一新历史征程中,美国无疑是能够对我们实现战略目标造成最大障碍的外部因素,必须尽最大努力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滑入新冷战。特别要抵制冒进的诱惑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蛊惑,“不畏浮云遮望眼,咬住青山不放松”。

最后,我们要在坚持原则和捍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善于从对方角度思考问题,保持策略的灵活性。特朗普政府在经贸、台湾、人文等领域的一系列做法,貌似进攻,实则防守,反映了美国政府面对中国实力上升和影响力拓展的不安及对自身霸权可能旁落的焦虑。从历史上看,这种地位焦虑常常是引发霸权战争的重要根源之一,我们对此必须高度重视。试想想,谁能心平气和地看到一个大块头进入舞台中央,甚至取代自己成为舞台的焦点?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更加理智地看待中美目前存在的一些分歧、矛盾乃至摩擦,采取主动措施,化解对方焦虑,展示政策善意和战略诚意,不让两国战略关系受到根本性动摇和冲击。同时,积极寻求利益重合点,通过务实合作,重建战略互信。

^① 美国《外交事务》双月刊在2018年第4期刊登了一组中美两国学界和战略界对坎贝尔、拉特纳文章的回应当和辩论,其中不乏对该文关于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论调的驳斥与批评。参见 Jisi Wang et al, “Did America Get China Wrong: The Engagement Debate,”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4, July/August, 2018, pp.183~195。

结 语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美权力的快速转移,两国在经济、安全乃至国际制度领域展开了日益具有战略博弈性质的竞争。对此,美国政府及战略界忧心忡忡,认为中国正在全面挑战美国霸权,要求改变对华接触政策,强化对华战略制衡、甚至在经济与人文交流领域与中国部分脱钩。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新定位及一系列强硬政策举措,尽管具有鲜明的特朗普个人色彩,但却基本上反映了近年来美国国内的对华新共识和对华战略的主流思潮。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绝非偶然,也不大可能“昙花一现”,对华制衡乃至脱钩有可能演变成美国的中长期对华战略。

在此背景下,如何处理中美关系、防止中美关系陷入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宿命,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战略难题。中国既要有战略信心与战略定力,相信只要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中国的发展;也要有战略清醒与战略远见,认识到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美国依然是全球头号强国,是影响中国成长为世界性大国的最大外部因素,要妥善处理中美分歧与矛盾,提防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避免与美国发生全面对抗;还要有战略智慧与斗争策略,既要抵制美方的不合理要求、维护好自身利益,又要坚持斗而不破、把握好中美关系大局。同时着眼具体议题,将中美合作的蛋糕做大,在合作中逐渐构建中美互信的基础。“维系中美合作的基本元素并未发生全面坍塌,促进中美友好的善意仍然拥有温度。”^①

韦宗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李墨)

^① 晓岸(安刚):《中美关系,是否做好了艰难协调的准备》,载《世界知识》2018年第10期,第67页。

Therefore , both countries should approach the issue with utmost care , avoiding any negligence. There is consensus between them on the issue: both recognize there is one China ,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 and both pursue a peaceful solution of the issu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obvious: China's ultimate goal is to realize reunification , Taiwan's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 and there can be no other choice , even though no reunification , no independence , no use of force and indefinite prolongation of the de facto separation of Taiwan from the motherland is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ne-China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 double-side policy , and the U.S. continues to have some substantial relations with Taiwan , including arms sales and other military ties. This is a major reason for fluctuations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Historical Route of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1979 ~ 2016)

Jin Weixing (34)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ino-U.S.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79 to the holding of the eighth round of the China-U.S.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and the seventh round of the China-U.S. high-level consultation o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in 2016 , the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have experienced four phases. The first phase was the post-Cold War decade of constructing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ased on mutual strategic needs. The second phase was the decade of negotiation over China's most-favored nation status in the U.S. after the Cold War. The third phase was the period of five years in which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and disputes had intensified since China joined the WTO , and the fourth phase was the decade of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on both side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have reveal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respective strategic goals , and the historical track of the evolution of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towa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RTICLES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 the U.S. Status Anxiety , and Donald J. Trump Administration's Strategic Adjustment toward China

Wei Zongyou (51)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 with the ongoing power shif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en engaged in

the ever-growing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the areas of economy , security , and institutions. The U.S. has been increasingly worried that its economic influence in Asia , it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 , its maritime hegemon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 and its institutional prestige are on the decrease as a result of China’s rising power and heated status competition in those area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hallenged the premise and rational of decades-long U.S. engagement policy toward China , defined China as the top strategic competitor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and took a series of economic , political , and security measures to balance China.

From Obama to Trump: the Evolution of the U.S.

“Hedging Strategy” towards China

Jiang Fangfei (75)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ntinuously been exploring the best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a rising China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Since Donald Trump became the U.S. President , he has made a series of adjustments in the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China strategy is a “critical” succession to the “hedging strategy”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 which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 new attempt in the gradual adjust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U.S. strategy towards China. However , because of the further narrowing relative strength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the sharp decline of Washington’s trust in Beijing , the type of U.S. “hedging strategy”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changed to “Weak Coordination and Strong Confrontation ,” which demonstrates a tendency of evolving to a confrontational strategy.

A Study on the U.S. China Policy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during the Era of Sino-U.S. Confrontation of the Cold War: A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Lyndon Johnson Administration

Chen Changwei and Niu Dayong (97)

This article scrutinizes th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America’s China policy during the era of Sino-U.S. confrontation. It focuses on the examin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 and channels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relation to China in the Lyndon Johnson administration. It argues that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did not possess enough resources to collect and process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the complicated issues of China. Due to the lack of a sufficient number of qualified China experts and the relative low position of these people in the bureaucracy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 there was an obvious disconnect between the working level and the decision-makers’ level. As a result , the President was more inclined to be swayed by more influential Soviet spe-